

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尹在勤 孙光萱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尹在勤 孙光萱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尹在勤 孙光萱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71,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078·3373 定价：0.65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序

一

这是对贺敬之同志诗歌创作的一部研究专著。它的两位作者——尹在勤和孙光萱，一个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任教，一个在上海教育学院讲课；身处两地而能共同完成这一著作，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由于他们以文会友、神交已久，共同地对这位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怀着由衷而浓厚的兴趣。因此，无疑，这部书首先是两位作者的友谊的结晶。

二

说到贺敬之同志，我记忆里便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乡村。夜晚。临时搭起的简陋的舞台。杨白劳和喜儿。赵大叔和王大春。黄世仁和穆仁智……那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季，在陕西的宝鸡市附近，我们军部的文工队演出《白毛女》，我作为师宣传队的一名队员在台下看戏。在此以前，我们早就知道《白毛女》这个戏，但看到它的演出这还是头一次。我们是抱着极大兴趣，走了十来里路专程去看这场演出的，看后受到了深深的教育和感动。当时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那

个秋夜，甚至在心理上还能体验到那萧瑟的秋风。我们是半夜里顶着星光、唱着刚刚学会的《白毛女》里的歌曲回去的……正是在那时，我从《白毛女》的剧本上看到了贺敬之的名字，并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且，不知怎么的，我认定，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的人——包括作曲者——都是年岁很大的人……

说到贺敬之同志，我记忆里还保留着这样的情景：上午。南开大学校园的“胜利楼”旁。好象是下课之后。同学们忽然争看起当天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着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我也看，而且对头几句印象很深：

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

呵，无边的

大海

波涛

汹涌——

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

呵，生活的

浪花

在滚滚

沸腾！

这首诗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一起，在五十年代中期，强烈地振奋和激动了我们这些大学生。坦率地说，要使少年气盛、“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们——而且是专攻文学的大学生们——对一部作品衷心地叫好，是不那么容易的。然而《放声歌唱》和《致青年公民》博得了异乎寻常的欢迎。这样的诗篇，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使我们的精神境界陡觉飞跃；而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和

一个文学系的学生，当时我虽然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并不陌生，对《放声歌唱》和《致青年公民》的艺术形式却又倍觉新鲜，只不过还讲不出所以然来。象这样的句子：

五月——

麦浪。

八月——

海浪。

桃花——

南方。

雪花——

北方。……

不知怎么的，只看一遍便记住了……

由于有这样的感受和记忆，当本书的作者之一尹在勤同志和责任编辑张有煌同志把校样给我，让我来写篇序文时，我是又觉得亲切、又惶恐不安的。说亲切，是因为我是诗人作品的一个热心的读者；说惶恐不安，是因为贺敬之同志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诗人，我虽然亦曾协助一位同志撰写过一篇评论贺诗的文章，却毕竟谈不上什么研究，怕不能准确地判断这部关于他的诗作的研究专著。

几经考虑，我意识到了这样一点，即：在文学上或者在其他任何方面，同辈人之间的评论，或者前辈人对后辈的评论，固然是必不可免的，也许还是很重要的，然而相比之下，后辈评论前辈，也许更是一个不可移易的历史定律。是的，正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才决定接受作者和编者这一友好的委托和信任。

三

我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老实讲，收获和感受是出乎意外的。

——我熟悉的贺敬之的诗，主要是建国以后的，而通过这部著作，我了解到，他写诗的历史已经长达四十年之久；而且，在我看来，他早年的诗写得颇为闪光，很有特色。大约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吧！读着他早年那些描写贫穷的农村和不幸的悲惨的农民生活的诗篇，常引我想起自己的故乡，回忆起自己的某些辛酸的经历，使我为之共鸣。因此，我觉得，他这些诗是朴质的，朴质之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自有其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

——我想，许多读者都是这样的：他希望欣赏一部好的作品和希望获悉那作品的诞生过程的心理，大约是成正比的吧！长期以来，我喜欢读贺敬之的诗，却不晓得他这些诗都是怎样写成的。如今读过这部《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之后，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两位作者几乎对诗人的每一组、每一篇重要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契机（也即所谓灵感的产生和爆发）、构思过程，都有或详或略的介绍。不仅如此，通过诗人生活经历的一些重要片断，这部著作还向读者介绍了诗人如何向往和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给我们勾勒出了诗人的几可感触的形象，使我们能够追踪着诗人的生活足迹，来考察和理解他的创作道路。生活气息和艺术气息交互印证，这是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的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特色，读来颇为引人而富有启发意义。例如，当我从这部著作中得悉诗人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的青沧战役中，以连队“文书”的身分，勇敢地 and 战士们一起夺桥攻城的战斗情景时，

我便觉得特别珍贵，而且，似乎由此对他的许多诗篇也有了更深的领悟。

——实事求是，文风严肃，是这部著作的又一重要特点。读着这部论著，我对两位作者油然而生出钦佩，这是由于他们始终对诗人贺敬之及其作品采取了冷静、全面、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以我的感受而言，这里并没有溢美之词。相反，他们历史地考察着诗人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和成长，历史地指出诗人某些作品的成就和局限，又历史地评价了象《放声歌唱》、《回答今日的世界》、《雷锋之歌》等等传诵人口的优秀篇章在我国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不容忽视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他们在肯定地论及贺敬之诗歌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和风格特点时，还非常细心而正确地考虑到其他诗人和作品的独特价值和贡献，而并无“独尊一家”的片面性。我认为这是两位合作者的很好的学风和文风，他们的这种科学精神赢得了我对他们的尊敬。

——资料翔实，观点鲜明，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是这部著作的一大优点。它在最后两章中，专门地、概括地从理论上论证诗人贺敬之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这对全书来说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体系性结构，更重要的是汲取别家的研究所得又鲜明地发挥了自己的见解。诸如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诗的民族化问题，时代精神问题，外来形式的借鉴和改造问题，古典诗歌、民歌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与和谐问题，政治抒情诗的地位、作用和特点问题等等，他们都有辩证、精当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又都是紧紧地从诗人贺敬之的生活、思想、文学主张及其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论证的，是论从史出的。在读过前八章再读这最后两章时，偶尔虽略有重复之感，总的说来是一种酣畅的论理的认识的升华，因而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理性的欢悦和享受。

——如果说这部著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我的感觉是：有的段落论述方法上和全书似有不甚谐美之感，有点儿学院讲义的痕迹。这大约是分头执笔、时间匆忙所致，算一个小小的美中不足吧！至于全书的基本立论和基本观点，以我现在的见识而言，如上所述，还提不出什么诘难。无论如何，在对作家、诗人贺敬之及其作品的研究上，他们的这部著作，是迄今值得重视的一个重要成果。

四

本书的两位作者，好象比我小几岁，实际上我们是同辈人、同代人。因此，我这篇序可算得是同辈人对同辈人著作的评论了；而依照我的见解，他们的专著和我这篇小序，也终将要受到后辈人的评论，这是肯定无疑的。

五

“时代造就了诗人，诗人忠实于时代。”“……在时代的上空翱翔，在时代的原野奔驰。”——我很欣赏这部书里的这些话。愿读到这部书的青年朋友，都能壮怀激烈地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投身于时代的大潮，或把自己锻炼成坚强不屈的战士，或把自己造就成冲锋向前的战士兼引亢高歌的歌手！

孟 伟 哉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孟伟哉	1
第一章	“到延安去!”	1
第二章	“向母亲倾诉冤屈”	18
第三章	奔赴前方	35
第四章	重回母亲的怀抱	54
第五章	放声歌唱伟大的祖国	72
第六章	呼唤他们响亮的名字	92
第七章	江山多娇情满胸	112
第八章	“我要唱呵,我要写”	126
第九章	同人民和时代相结合 ——诗人创作道路纵论	143
第十章	不倦的探索 and 追求 ——诗人艺术成就纵论	179
后记		226

第一章 “到延安去！”

“到延安去！”……这是曾震响在无数革命者的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召唤声。怎么能够忘记，当我们还是少年或者青年的时候，在大半个中国的黑暗天空下，我们曾是怎样地在心中高呼着这句话！那时，我们还不敢说“延安”这个名字，我们说：“到‘那边’去……”是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人生经历中最珍贵的一页，生命就变得如此壮丽的了。

——贺敬之：《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

是的，诗人贺敬之的人生经历中最珍贵、最壮丽的一页，应该从“到延安去”写起。那么，他是怎样到延安去的呢？

请看他留下的一串脚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阴历十月初九），贺敬之诞生在山东峰县（今枣庄市郊）贺家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他曾经在后来写下的《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一诗中，真实地描述了他诞生时的情景：“雪落着，风，呼号着，夜，漆黑的夜……在被寒冷封锁的森林里，在翻倒了的鸟窠中，诞生了一只雏鸟……挂满蜘蛛网的破屋子里，我的祖母跪在屋角，连连地磕头祷告：‘天

呵，俺喂他什么吃的？——这个小东西！’我的父亲，躲账在村庄的酒馆里，又赊了账，醉倒在柜台边……，亲爱的同志，这就是我的自传的第一页：时代+灾难+母亲，这，我就生长起来。”这是贺敬之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延安入党前夕，遥望几千里外的家乡，追念童年时代生活时所写下的自传式诗句。

贺家窑当时是一个百来口人的小村子，相当闭塞，贫穷。贺敬之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家庭，可以想见，他的童年是过得凄苦而惨淡的。全靠亲友的帮助，他才进了家乡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直到一九三七年，他才又考上了设在滋阳县的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都是穷学生报考的。贺敬之当时心想，读这样的学校，出来可以当个小学教员，有个谋生的职业；另外，在学习期间，学校每月还有八块钱的贴补，可以解决伙食问题。于是，他多少带着一点兴奋的心情，跨进了这学校的大门。读乡村师范，年龄是不受限制的，同学中最大的有二十多岁，一般的是十七八岁，而贺敬之是最小的一个，当时只有十三岁。

但是，他进入这所学校没有几天，“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很快打过了黄河，眼看就要到济南了。在一片动乱之中，学校开始动员学生们回家。贺敬之回家之后，在几十公里之外，紧接着就发生了台儿庄大战。战斗结束以后，山东的一些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和乡村师范），都一起流亡迁往湖北西北部的郟阳和均县。贺敬之在家乡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一九三八年春天。于是，他和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几个同学合计，也决定离开家乡，到湖北找学校去。

这是临行前的一个晚上。

贺敬之一家人，围聚在一起。母亲流着眼泪，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抚摸着儿子的衣襟，泣诉着，劝阻着，她怎么舍得儿子远行

呵！但是，崇高而慈祥的母爱既然改变不了无情的现实，又怎能拴得住儿子的心！贺敬之决定要走了，走“这长长的道路，这漆黑的道路”！夜深了，泪干了，母子终于相对无言，彼此把一片深情按捺在心底。在如豆的油灯下，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五块钱钞票抖抖地塞进儿子的衣角里，找来针线，密密地缝上……

出发了。

从家乡的那棵老槐树下，小小的贺敬之出发了；

同比自己年长的同学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一起，年仅十四岁的贺敬之出发了。

他们四人，背负行装，步行到了临近津浦路附近的一个小站贾汪，在混乱中爬上了火车。火车沉重地呼啸着，喷吐着浓黑的煤烟，驶向远方……

他们到了徐州。作为“难民”，他们找到了徐州战地红十字会，排着长长的队列，领到了一点点充饥的食品。又从徐州出发，在同样的混乱中爬上火车，到了郑州。然后，又从郑州爬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

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但却惊人的插曲。

因为日本飞机轰炸，铁路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火车每到一个站，难民们都拚命抢着往上爬。贺敬之他们四个人，自然也是这样挤在难民堆中爬上火车的。这个小而惊人的插曲，就发生在从河南许昌到漯河这段线路中间。

实在是太拥挤了。他们四人爬上火车，根本进不到车厢里去。怎么办？他们只得爬到车厢顶上挤着。夜间，火车开到漯河附近，突然上来了几个人，拔出匕首，向他们要东西。抓住车把的陈德秀开始带头反抗。哪知他一反抗，猛地就被那几个人一家伙推下了火车。陈德秀惊叫了一声。火车不停地开走了。

到了下一个小站，火车停了。年纪比较大的孙炳成说：“我们赶快下车，找陈德秀去！”于是，三人立即下了车。他们沿着铁路线，倒回过去找寻着自己的同伴，焦急着，呼喊着，找呀，找……

陈德秀被推下去时，身上还挎着一个小包袱。除了他自己的东西外，里面还装着贺敬之临行前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那五块钱。因为离家以后，小小的贺敬之觉得，钱缝在自己的衣角里还不保险，于是又取出来，交给了陈德秀，认为让他保管更可靠一些。想不到恰恰又出了这个意外。所以，贺敬之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那首自传式的《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一诗中，又特意写下了这样几句：

我被抢去了
在衣角里
母亲缝进去的
五块钱钞票……

后来，陈德秀终于被找到了。三人急忙凑上前去，看到的是陈德秀那被撕破的衣衫，被摔伤的血痕……

贺敬之人生经历中遇到的这第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如此清晰、如此深刻地留在了他的心窝之中！

贺敬之他们四个人，继续爬火车南下，终于经过了千难万险，又遇到过好些类似的惊险插曲，才到了武汉。好不容易又从武汉坐上了去汉水的汽船，吃着大饼，喝着江水，流浪到了地处湖北西北部偏僻的均县。

当时山东流亡出来的一些中等学校，都集中在湖北的郧阳和均县。学校的总名叫国立湖北中学，郧阳是总校，均县是分

校，就读的都是山东的流亡学生。均县分校是师范部，所以贺敬之他们到了均县。贺敬之在这里呆了不到半年，日本侵略者又打到了武汉。人们从武汉撤退了。学校又流亡到四川。

一九三八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从湖北均县出发，一直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了四川。

到了四川以后，学校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总校设在绵阳，下属四个分校。贺敬之所在的是第一分校，校址设在绵阳地区的梓潼。贺敬之在这里呆了一年左右。他学普通中学的课程，代数呀，国文呀，什么都上。考试时他的成绩往往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他主要的兴趣和精力，却都用于写东西，这时，他已经开始练习并沉醉于写诗，写散文。此外，就是花了不少时间参加编壁报，参加歌咏活动，参加街头演出，参加读书会，等等。在这些带有救亡性质的活动中，他都是一名积极分子。

抗日的烽火在熊熊燃烧。流亡在这四川北部偏僻地区的学生们，一腔热血也在滚滚奔腾。四个分校的一批进步师生（教师中有廉立之、张超、李广田、陈翔鹤、方敬等；学生中有贺敬之、李方立、侯金镜、朱寨、孙跃东等），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同学校反动当局，同监视进步同学的三青团组织，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高呼抗日，反对压制，反对贪污行为，进行请愿，示威。尤其是设在罗江的第四分校，更搞得热气腾腾。李广田、方敬等一些老师带领一批同学，在第四分校还办了一个叫《锻冶厂》的小型铅印刊物，发表师生们呼吁民主、宣传抗日的作品。贺敬之虽然在第一分校，但是，他很向往第四分校，同第四分校的同学保持着联系，还为《锻冶厂》撰写作品。一九三九年夏季的一个雨天，贺敬之打着雨伞，踩着泥泞的道路，从梓潼步行到罗江四分校，找到了李广田老师，要求转校。但因四分校的人数

实在太多，转校未成；不过，贺敬之也没有白跑一趟，他因而有幸听到了李广田老师讲的一堂课，讲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

进步的环境，进步的空气，唤醒了贺敬之明确的革命意识。就在四川北部国立第六中学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贺敬之除了同一般的进步师生交往以外，更同比他年纪稍长、年级稍高的李方立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也认识了顾牧丁。一九三九年暑假后，李方立、顾牧丁已经毕业，他们到成都谋生去了。贺敬之就同他们保持了通信往来，主要是同李方立联系。同时，贺敬之这时还在顾牧丁在成都编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一些诗和散文，又给《大公报》、《华西日报》投过稿。

就在那些通信中，贺敬之怀着无限的激动之情，向李方立倾诉着自己的心声：

“到那边去！”

这是一个暗语，是一个生活在“这边”而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强烈的愿望。

李方立很快回了信。信中说，他准备从成都约几个同学到梓潼来。

时间到了一九四〇年春天。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李方立从成都到了梓潼，在第一分校所在地的文昌庙，找到了贺敬之。

“走！”李方立把贺敬之叫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

“上哪儿去？”贺敬之问道。

李方立不便多说，就急匆匆地把贺敬之领到梓潼城里很偏僻的西南角上的一个小旅馆里。

不一会，另外两个同学也来了：一个是吕西凡，另一个是程